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投资、企业和发展委员会
 外部资源对发展尤其是生产性能力建设的
 贡献和有效利用问题专家会议
 2010年2月22日至24日，日内瓦

外部资源对发展尤其是生产性能力建设的贡献和有效利用问题专家会议报告

2010年2月22日至24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目录

	页次
一. 主席的总结	3
A. 第1场会议—资本上坡倒流：对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影响	3
B. 第2场会议—确保危机后债务的可承受性	5
C. 第3场会议—促进生产性能力建设的外国直接投资	6
D. 第4场会议—官方发展援助：确保2015年前乃至以后都持续增长	8
E. 第5场会议—建设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能力	10
F. 第6场会议—特别圆桌会议：联合国发展融资及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问题会议的后续活动	11

二. 组织事项	12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12
B.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12
C. 会议结果	13
D. 通过报告	13
附件	
出席情况	14

一. 主席的总结

1. 外部资源对发展尤其是生产能力建设的贡献和有效利用问题一年期专家会议于 2010 年 2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博士致开幕词，赞扬了出席会议人士，指出会议召集的专家阵容强大，讨论的议题又十分得当。他说，专家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讨论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外部资源的现状，而且也要提出问题，着重指出未来十年外部资源流动面临的挑战。

A. 第 1 场会议—资本上坡倒流：对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影响

2. 专家们认为，目前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不仅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总体下滑的斗争构成挑战，而且也重新思考这些不同的发展战略模式提供了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 (a) 正在变化的资本流动格局；(b) 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金融和货币压力过程中采取的最新对策；(c) 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

3. 专家们首先研究了资本流动的格局，以及资本与一般经济学理论预期的相反转而从穷国(“上坡”)流向富国的程度。总的来说，实践经验表明，资本的净流量 15 年来一直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但是，有位专家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效果主要是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造成的，后者有大量资本流向前者。排除这种特殊情况之后，则资本净流量一向都还是流向穷国的。

4. 但是，有人指出，这种结论的经验证据只是在 2002 年之前还站得住脚。许多亚洲经济体的增长率很高，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显露出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变化的迹象。贸发会议的《2008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UNCTAD/TDR/2008)表明了世界经济的这种变化：若干中等收入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并没有出现资本净流入，但其发展速度却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5. 在以前的 50 年里，发展中国家必须得应付全球贸易账户自由化的压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最佳办法是调动外国储蓄的主张。多数发展经济学人都坚信，资本充裕的国家应该将剩余资本转移到穷国去填补储蓄缺口。自本世纪初出现的转折以来，这种主张一直受到质疑，因为这种政策取向在几大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践中开始遭到挑战。

6. 有位专家着重指出，虽然目前的金融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到资本净流入逆转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说明必须绝对避免资本的净流入。相反，倒是有必要弄明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将流入资本转化为投资，从而创造增长。要比较妥善地掌控资本流入逆转容易造成的伤害，必须考虑到许多因素，例如流入资本的构成以及监管和体制框架。

7. 另一位专家指出，讨论资本流动的方向问题本身并不重要。讨论资本流动及其宏观经济影响，更需要评估这种流动究竟是为了战略性、生产性能力建设还是仅仅为了投机和短期获利。接着自然而然地要评估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联系密切还是毫无联系。

8. 一些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具体针对研讨的时段和区域，提出了反对观点。一位专家提出了增长率高但资本流入格局不同的三个区域作证据，说明资本流入与增长的关系不大。另一位则强调说，私人资本净流量异常增加，是若干发展中国家 2003 年至 2007 年蓬勃增长的一个相关因素。由此证明，这场危机因资本流量的下降、无论是私人投资量还是官方援助量的下降，对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影响，对此感到关切是完全有理由的。

9.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的不是调动外国储蓄，而是投资的增长，财政上的负责、货币政策空间的利用以及国家促进私人投资的作用。这突出说明目前流行的发展政策模式在演变，需要建设一种新型的“发展型”国家。

10. 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的高增长是舍弃先前的政策模式的结果。实际上，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开始学会如何制止汇率高估的倾向。同样，有人着重指出，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成功保持了汇率的竞争力，以国内投资推动增长。因此，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小于发达经济体。

11.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前欧洲新兴国家的经验，一位专家坚持认为，这一区域显示出一种例外情况，与现有的表明增长与资本流入有关的证据不同。由广泛的金融融合的驱动，新兴欧洲建立了一段顺利增长期。因此，决策者目前的任务是确保采取一种有可能通过增长利用流入资本的发展政策，但是他们防止了不可持续的失衡的出现，因而金融融合利大于弊。

12. 有几位专家研究了增长与流入资本具体分配的联系问题。大量资本流入如用于投机，则可能造成一些经济体无法承受的局面。东欧一些经济体的繁荣而近来愈崩溃的情况即是一例。那些国家接受了大量流入资本，造成其货币估值过高，今儿丧失市场份额。现金账户赤字巨大，币值高估，两者一起造成特别脆弱的局面。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市场参与者的“信心”缺乏，于是这些国家为迫切的预算赤字融资并采取其他反周期措施时突然遇到了严重的制约。

13. 在探讨今后的应对办法时，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有：

(a) 在那些断定国外融资对增长有重大作用的人看来，对策应该立足于恢复危机前的资本流入水平，并改进流入的管理；

(b) 资本流入对增长的作用只有将其引导到生产性用途上才能得到加强，从这种观点出发，决策者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c) 在那些断定资本流入风险大而且往往可有可无的人看来，发展战略应该注重加强国内投资；

(d) 依在那种认为外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一向是跑龙套的观点看来，决策者应该注重其它因素，诸如机构、教育和医疗开支。

B. 第 2 场会议—确保危机后债务的可承受性

14. 专家们首先分析了目前危机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其中区分了利用《重债穷国倡议》的国家和没有参加重债穷国集团的国家。虽然预测显示危机之后重债穷国的增长率将下降，但是其债务偿还还会保持稳定。另一方面，非重债穷国的增长率会比较强劲，同时债务偿还也会增加。这些预测随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将国内债务考虑进去，则出入会很大。实际上，低收入国家国内债务缺乏可靠的资料，这对适当分析其债务可承受性的工作构成严重的制约。债务可承受性分析工作应该包括国内债务的有关资料。

15. 有人注意到，危机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甚小，因为这些国家与国际市场的融合程度有限。但是，低收入国家由于货币政策不得力，出现了汇率上升、资本流动疲弱以及汇款量很低的问题。情况表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低收入国家极容易受到汇率和利率风险的影响。有人建议这些国家将其债务构成变为偿还期较长的债券，并可将其外债转为国内货币债券。此外，这些国家还需要对其资产进行适当的管理，加强现有的资本市场，使其汇率制度具有灵活性。对中东/北非国家做了产油国和非产油国的区分：前者政府必须继续花钱，加强资本市场，而后者应该尽量利用财政空间和货币政策。

16. 在非洲的重债穷国方面，乍得的债务可承受问题突出表明其中许多国家都经受了外生冲击。乍得 2009 年的石油出口收入下降了 50%多，但是其债务据认为可以承受，至少可望保持这样的情况，直至其石油储藏下降。该国目前正努力维持一种谨慎的借贷政策，力争从多边借贷方获得优惠资源。

17. 有几位专家强调国际社会具有根据当前危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债务可承受性的作用。有人对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政策和体制评价(国评法)主观分级法制定的《债务承受力框架》(《框架》)表示关注。国评法给一个国家的政策和体制评分，依此确定一个国家的债务门槛。2009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确认低收入国家需要增加援助，因此对《框架》做了某些调整，增加其灵活性。两项主要的调整是：第一，《框架》承认公共投资对增长的影响；第二，在某些情况下，《框架》可以将国有企业排除在外，以降低私人外来债务的门槛。有人还补充指出，低收入国家政府可以对公司板块过度向国外借贷征税。这两项修改，尽管不大，却表明了布雷顿森林机构有意改变其立场，但方向未必一定正确。

18. 有人对低收入国家能否偿还债务问题提出了另一种担心。据有人着重指出，这些国家由于除了进一步借款还债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应该从发达国家得到

更多的赠款。此外，诸如贸发会议提出的一种暂停还债的做法对某些的不是全部低收入国家来说是一种解决办法，因为这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存在的由债务减免倡议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有人建议暂停还债的做法应该着重于超过某种程度的债务偿还问题。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将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千年发展目标》、与目前正用于为《千年发展目标》的赠款和贷款联系起来，因为捐助方会减少贷款，改用剩余的资金作为赠款提供。许多非洲国家，例如乍得已经将《千年发展目标》列入其国家经济和预算政策之中。另有一种建议是加大力度发行新的特别提款，则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流动性和发展援助。最后，有人极力主张更加妥善地运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诸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农业政策研究所等。

19. 有几位专家指出，新兴的中等收入发展中经济体从危机中复苏的速度高于发达的市场。仅在这场危机之前几年里，就曾有人怀疑新兴市场增长的可持续性。

20. 一些专家坚持认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非常出色地经受最近的这场金融风暴，这最终证明其中一些国家具有不断演变进化的性质。他们着重提到三大结构(即永久性)变化，说明这种演变进化情况：**(a)**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蓬勃发展的年份在财政上实行非美元化和非杠杆化，充实了家底，同时大量极具外汇流动资产；**(b)** 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提高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成绩；**(c)** 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足以成为拉动亚洲新兴市场 and 商品出口国家增长全球性引擎。这些变化大部分都有前几次危机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削弱了过去外部冲击在国内放大、引发新兴市场危机接踵而至的影响，使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自从采用资产分类以来首次能够实行反周期政策。有专家坚持认为，这些“先进的”新兴市场介于传统的新兴市场和发达的开放经济体之间，例如澳大利亚或加拿大，须由投资者和研究人员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

21. 上述情况加上采取了反周期政策，说明了新兴市场为何比世界其他地方较早而去活力更大地从当前的危机中复苏过来。诸如巴西之类的国家利用外汇储存抵消了汇率的动荡冲击，减轻了全球市场的影响，从而限制并控制住金融破坏程度。虽然新兴经济体的债务总水平上升了，但是债务结构依然未变。

C. 第三场会议—促进生产性能力建设的外国直接投资

22. 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特别是通过探讨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输送资本、技术、专门知识和市场准入权的潜在作用，探讨了外国直接投资和生产性能力建设之间的联系。经验表明，直接外资的承诺并不总是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难以吸引到直接外资，而且也难以利用外资。

23. 在有些板块，例如设备制造板块，外国公司企图接管中国的龙头企业，引起人们对行业垄断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的关注。

24. 具有广泛共识的一点是，如果缺乏最低程度的国内能力，会限制直接外资的流入及其对发展的影响。专家们一致认为，跨国公司是追求利润的公司，它们的投资目的不是促进发展和增长。它们的进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在别的情况下也可能使现有的问题恶化或者造成新问题。专家们从理论上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跨国公司的进入可能会抑制本地实力的发展：**(a)** 跨国公司进入可能给当地公司造成不利的竞争环境，将它们排挤出去；**(b)** 吸收直接外资所需的严格知识产权规定会阻碍本地进行学习；**(c)** 对于跨国公司的补贴和奖励可能会抵消直接外资的社会回报，对本地公司形成歧视；**(d)** 直接外资集中在自然资源板块，可能会导致“荷兰病”，阻碍其他板块竞争力的提高，对经济多样化造成不利影响。

25. 他们强调了各国政府创造有利环境的责任。一位专家建议将直接外资的作用视为发展催化剂作用的作用，可以通过提高利用率以及资源效率更高的配置，通过引导技术和组织效率的提高，增强本地的生产能力。

26. 另一位专家对市场的潜力和企业促进发展战略的潜力提出质疑，坚持认为对企业有好处的未必一定对国家有好处。他强调各国必须首先制定一种明确规定优先事项和工业战略式的产业政策。他也同意直接外资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却坚持认为直接外资政策的制定应该在其次，应该作为“二阶”战略放在更大的发展战略范围内加以考虑。

27. 另一位专家将这些观点解释为以工业政策抗衡直接外资政策。他不以为然地指出，这没有反映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成功国家的情况，他还补充指出，能够成功执行工业政策的国家恰恰就是能够吸引直接外资并使其产生效益国家，而不能成功管理好直接外资的国家，也无法成功执行工业政策。

28. 专家们也讨论了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扩大直接外资对生产性能力建设的贡献。他们强调投资教育的重要性，不仅仅投资于理工教育，而且也要投资于中等和高等教育。一位专家坚持认为应该瞄准分散的直接外资，因为这种外资内含对本地文化和状况的了解，因而社会回报率比较高。他着重指出，调研结果表明来自南方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贡献往往比来自北方的大，它们往往在当地市场上采购大部分关键资源，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本。一位代表则坚持认为，当地公司对生产性能力建设的作用可能比外国公司好，他建议避免通过给予跨国公司过多的激励而实际上对当地公司形成歧视，要求平等对待外国公司和当地公司。

29. 谈到这种观点，一位专家主张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制定一种共同的税收政策，建议将直接外资与贸易一起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中，并列入争端解决机制，不过他对这种倡议能否得到一些正在变成重大向外投资国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表示怀疑。最后，谈到当地、外国、分散、南方和北方等各种投资之间的比较问题时，一位专家强调必须避免歧视，各种投资一律平等对待。

30. 另一位专家提议学习成功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各国政府应该无采用的四大政策取向，以确保直接外资对生产性能力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a)** 避免采用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b)** 实行有力的基础政策；**(c)** 控制汇率以免币值过高；**(d)** 暂时保护新生行业，因为学习过程不是立竿见影的，当地公司需要实践创建和巩固新生实力，这样才能吸收利用以后流入的直接外资的好处。他承认，正如一位持反对意见的专家所说，新生行业政策由于这一点而可能有风险，但是《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不是解决之道。

D. 第 4 场会议—官方发展援助：确保 2015 年前乃至以后都持续增长

31. 全体专家都十分明了，由于缺乏计量经济学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直接取得的明确数据的支持，仍在进行的关于援助和增长之间关系的这场辩论因而受到了损害。但是，专家们普遍公认，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资本的流入，使得技术有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官方发展援助在危机和灾难时刻发挥着重大的人道主义作用。

32. 自 2004 年以来，官方发展援助水平一直在提高，但是仍然远远低于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国民生产总值 0.7% 的目标。官方发展援助的构成情况仍然十分多样，越来越多的援助用于社会支出、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开发，目的是支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近年来，“发展援助”由于没有实现明文规定的发展目标而受到严格的审视。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主张对援助拥有主权和特许权，贸发会议要求用于提高生产率和加强社会开支的援助形成一种适当的结构，强调指出这两种援助可以相辅相成。

33. 援助依赖症和援助疲劳症也已成为重要问题。某些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很高，突显援助吸收能力问题的重要性。为了提高这种能力，援助必须以受援国的需要为动力，而不为捐助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与倾向所左右。受援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应该确定向该国提供援助的战略重点。援助疲劳症是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这导致援助出现“周期倾向”的危险，即“好时光”作出的雄心勃勃的援助承诺到了“坏时光”由于捐助国缺乏财政资源而遭到削弱。目前必须减少官方发展援助的波动性，打破援助的周期倾向，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时候要保护发展中国家。

34. 一位专家表示，讨论外部资源对发展的作用问题实质上就是讨论“手段”（这里说的就是官方发展援助）和“目的”（增长）之间的联系。为了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必须深入了解“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问题不是官方发展援助本身对增长有何影响而是外人何以促进增长的问题。

35. 目前普遍公认的是长期增长有赖于一系列因素：**(a)** 增加投资和经济活动的好机构；**(b)** 宏观经济的稳定；**(c)** 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转移；以及 **(d)** 避免《华盛顿共识》型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因素中有许多是以环境为转移的；例如，如何创造好机构、提倡哪一种机构、机构采取何种形式等等。这些因

素很大程度上以国家为转移，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例如，中国的乡镇企业，《华盛顿共识》在 20 年前是不会作为一种优先的体制结构向中国推荐的，但是这些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36. 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具有结论性的经验证据证明外部资源可以促进增长。实际上，经济史表明，向外投放私人资本和较少依靠外国资源的国家成长比较快。有证据显示，外部资源和官方发展援助会使本地经济增长放缓，这是由于如下两大因素：

(a) 官方发展援助割断了国家与其人民之间的联系。而且为了达到获得援助的条件和补充援助国融资项目的需求而消耗了国内资源，从而使资源从本国优先发展项目分流出去；

(b) 官方发展援助造成不利于增加受援国制造业出口的因素，从而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援助的流入也导致汇率估值过高，削弱了受援国的出口竞争力，减少了出口收入。

37. 有人建议援助问题研究的重点应该从“援助的有效性”分析转向“外人”何以帮助受援国实现增长，或者干脆说“不帮倒忙”。为此，未来研究的方向应该是“不提供援助议程”，不过这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这样一种议程在政治上会遭到反对，一方面发达国家作为捐助国因其活动和利益受到损害而反对，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具备政治力量推进这种议程的也会反对。

38. 另一位专家对近几十年来援助问题辩论作了综述并指出，自 1960 年代以来，偏见、意识形态和有所选择仍然是外国援助的决定性因素。人们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必须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增加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援助。但是，对援助在较差的政策环境里的效果就没有那么一致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利用外部融资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调集国内政府的收入(资源)，做到两者得当的结合。

39.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重新审视援助结构、寻找新的发展融资形式和来源提供了机会。但是，必须承认援助作为货币和资本简单的转移，如果不是根据受援国的发展需要和重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则不足以促进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为了确保援助不至于阻碍受援国努力建设其本地体制，阻碍其发展轨道。这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尤其重要，因为援助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可能会有损受援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

40. 另一位专家提出了一个捐助国为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的有效性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a) 改进发展援助准则；(b) 指定力争符合受援国具体发展重点的具体国别方案；(c) 扩大多边合作和援助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d) 简化援助程序；以及 (e) 修订援助评定准则，确保伙伴国积极参加援助项目的评定。

E. 第 5 场会议 — 建设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能力

41. 有人强调指出，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使经济发展尽量达到充分就业，产能尽量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促使这种产能长期得到扩大。在这方面，投资和资本积累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不应该将收支平衡的政府账户和国外账户以及低通胀视为可行的政策目标，而应该看成是对达到充分就业和发展状态的制约因素。

42. 根据这种程序，《华盛顿共识》集中体现的正统观点认为国家应该尽量不进行造成扭曲的干预，集中关注“控制好物价”。但是，这种方针有两个根本问题：(a) 何以确定“合适的物价”？(b) 这种所谓的“合适的物价”是否有利于发展和收入的扩大？而且，历史的证据也与这种传统观点形成对照，因为增长的黄金时代发生在古典的发展模式之下，绝不是发生在《华盛顿共识》之前的 30 年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国外资金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投向实体经济部门，而是用于消费和投机活动，对汇率和利率造成负面影响。

43. 有人着重指出，提高投资率和加速资本积累主要依靠的不是私人资本流入。国内生产性能力建设的开支无论如何可以也应该在国内融资，而国外借贷只应该用来为创造和提升生产性能力所需的进口资本货物提供资金，只应该用在出口不足以创造所需外汇的情况下。经验表明，保持低通胀、减税以及保持预算平衡并不能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投入资金的兴趣。相反，倒是可以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争取稳定实际汇率，避免币值高估，并通过反周期地稳定国内需求积极影响这种兴趣。此外也可以通过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予以支持。面向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内金融板块的发展，过去 30 年里不曾受到重视，如今被认为对于提供必要的投资融资至关重要，其中或许还需包括建设生产性能力过程中社会需要的项目的公共融资。

44. 有位专家不以为然地指出，根据上述分析看来，作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组成部分，确定低通胀目标和减少财政赤字之类的指标，对建设生产性能力并非毫无用处。相反，这种政策往往降低了投资的兴趣，促使国内投资信贷的成本高得无法出手。他坚持认为国际组织应该支持那些允许采取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政策优先项目。在问答阶段，有人争辩指出，不应该忌讳为国内公共投资支出融资造成的公共债务货币化，因为这与利用国外借贷为这种支出融资一样，并不那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也有人争辩指出，相对优势的理论如果言之成理，那也只是在没有货币的世界里才这样。在真实世界里，国际竞争力和贸易模式受到资金流动及其对汇率的作用的极大影响。

45. 据另一位专家认为，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全球危机促使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重塑自身，实际应用的人不应错过机会，要转而采取一种真正立足经验的方针。同样，这位专家还坚持认为，历史记录一成不变的表明，经历过持续不断向前追赶的比较少数的几个国家就是这样，它们推动结构变革，激励向实体经济部门进行生产性投资。利用熊彼得非完美竞争——其用武之地主要在工业部

门一的动态收益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可以通过不断创新和连续的学习摹仿获取增加回报的好处。

46. 这些专家坚持认为，如果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为这种持续不断学习过程提供了同样的空间，那么就必须注意某些部门的社会回报可能与私人获利率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政府可以积极行动，建立熊彼得体制机构，利用动态寻租的潜力，而不是专注于可能不利于经济多样化的静态寻租活动。

47. 最后，这位专家着重表示，熊彼得“创新性破坏”进程需要出现最低限度有效的仿效规模；因此发展中效果应该争取深化区域融合，同时保持政策空间，以利于在创新动力方面具有极大潜力的那些部门的成长。

48. 讨论小组一致认为必须确认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更加向《哈瓦那宪章》(1948年)的发展议程看齐，包括即使短期内会有损自由贸易也必须实现就业和制造业的增长。

F. 第 6 场会议—特别圆桌会议：联合国发展融资及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问题会议的后续活动

49. 在一则关于后全球经济危机时代发展融资问题的报告中，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主管经济发展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乔莫·夸梅·孙达拉姆先生强调《蒙特雷共识》对于外部资源促进发展的作用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共识》涉及六大问题：国内资源的调动(税务合作)、资本流动、贸易、官方发展援助、债务及一系列其他系统性问题。他说明了蒙特雷各项承诺的落实如何在所有领域里均未取得足够的进展，不足以解决仍然困扰全球发展融资的那些关键问题。

50. 为了使外部资源对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目前仍然需要根据《蒙特雷共识》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他强调说，是一种比较具有包容性的更加切实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重点和需求的**多边主义**。鉴于这一点以及最近的金融危机，我们必须确保各国际机构的改革努力具有广泛性，从而确实建立起一种更加着眼发展、具有包容性、并且得益于政策更加协调一致的金融体系。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多边融资工具的改革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进展。近年来，各国对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但是成功率却一直十分有限。

51. 因此，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式适当的时机，可以借机加强对至今都不是着眼发展的**多边监管体制**的改革。在这种危机时刻需要采取的关键步骤应该争取**(a)** 遏止危机跨境蔓延(传染)以及向实体经济蔓延(保障流动性)；**(b)** 运用**财政措施**(财政空间)和**货币措施**(货币空间)使经济摆脱衰退；**(c)** 在国家国际层面上加强进行有关的**金融监管改革**。但是，这些任务十分艰难，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应对能力受到的一些重大制约看，很有挑战性。造成制约的原因是金融系统、市场和机构的**亲周期性**、**自由化和开放**导致生产性能力的丧失，以及捐助方施加的**财政条件**。

52. 因此，系统改革议程目前的重点应该是：(a) 以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宏观金融稳定；(b) 审慎的风险管理，包括资本的管控；(c) 通过一种发展型金融系统实现金融增长(产出和就业)；(d) 确保比较具有包容性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成；(e) 使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以联合国发展议程为准绳，保持蒙特雷政策的协调一致；(f) 特别要支持联合国继续作为领导多边体制全面改革进程的全球合法论坛。

53. 在应对随后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时，夸梅·孙达拉姆先生着重阐述了法国总统尼古拉·萨尔科齐近来一则声明的重要意义，声明要求必须实行新的全球货币治理。他还表扬了争取对金融部门实行监管的初步措施，尤其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根据所谓的“沃尔克规则”提出的建议。他坚持认为这种声明必须在 20 国集团会议上和更大的范围内获得一席之地。由于发展中国家在 20 国集团会议上没有充分的代表性，夸梅·孙达拉姆先生呼吁认真考虑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设立全球经济理事会的建议。如果这样一个机构纳入联合国范围，则宪章需要作出重大修改；但是可以设想采取一些可以非常迅速落实的临时措施。例如，每年举行会议的大会总务委员会吸收一些大国以及国际社会其他一些重要方面的代表参加。总务委员会有了这样的代表面，就可以担当起拟议的这种作用，例如在大会之前或根据需要其他时间举行会议。而且，既然这样一个会议是峰会/领导人级会议，当然可以作为 20 国会议或其他任何自选成员的委员会会议的补充。另外作出的这种安排会具有正当性和很强的代表性。

二. 组织事项

A. 选举主席团成员

54. 在 2 月 22 日星期一举行的全体开幕会议上，专家会议选举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 莫里西欧·阿尔弗雷多·佩雷斯·塞佩达先生(洪都拉斯)

副主席兼报告员： 塞美雷·特斯法耶先生(埃塞俄比亚)

B.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55. 在全体开幕会议上，专家会议通过了本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载于 TD/B/C.II/EM.1/1 号文件)。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外部资源对发展尤其是生产性能力建设的贡献和有效利用
4. 通过会议报告

C. 会议结果

56. 在 2010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的全体闭幕会议上，专家会议商定由主席总结会议讨论情况(见第一章)。

D. 通过报告

57. 还是在本次闭幕全体会议上，专家会议授权副主席兼报告员在会议结束后在主席的主持下具体完成报告的定稿。

附件

出席情况 *

1. 贸发会议下列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专家会议：

阿尔及利亚	意大利
阿根廷	约旦
奥地利	卢森堡
孟加拉国	马来西亚
巴西	摩洛哥
喀麦隆	缅甸
加拿大	尼日利亚
中非共和国	秘鲁
乍得	葡萄牙
古巴	沙特阿拉伯
吉布提	南非
多米尼加共和国	西班牙
埃塞俄比亚	苏丹
法国	斯威士兰
德国	泰国
海地	多哥
教廷	土耳其
洪都拉斯	美利坚合众国
印度	津巴布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出席会议名单见 TD/B/C.II/EM.1/Inf.1 号文件。

2. 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政府间组织如下：
 - 非洲联盟
 -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 欧洲联盟
 -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
 - 世界海关组织
3. 派代表参加会议的联合国组织如下：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
4. 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专门机构或相关组织如下：
 - 世界银行
 - 世界贸易组织
5. 派代表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如下：
 - 哈基姆基金会
 - 世界工程师
 - 第三世界网络
6. 应邀参加专家会议讨论的专家如下：
 - Dilek Aykut 先生，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先生，Fundacao Getulio Vargas 退休教授，巴西圣保罗
 - Jeromin Zettelmeyer 先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伦敦
 - Bernhard G. Günter 先生，美国弗吉尼亚州 Falls Church 孟加拉开发研究中心主任
 - Simon Neaime 先生，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兼系主任
 - Eduardo Levy Yeyati 先生，Torcuato Di Tella 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布宜诺斯艾利斯
 - Rubain Adoumtogue 先生，经济和规划部项目分析评估师、经济学家，恩贾梅纳
 - V.N. Balasubramanyam 先生，联合王国兰开斯特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

Stephen Gelb 先生，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系和 EDGE 研究所，南非约翰内斯堡

Mario Cimoli 先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生产、生产率和管理司司长，智利圣地亚哥

Conrado Falco 爵士，秘鲁促进私人投资议程信息和经济研究主任，利马

Arvind Subramanian 先生，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盛顿特区

George Mavrotas 先生，全球发展网首席经济学家，新德里

Donald Ndwandwe 先生，经济规划和发展部援助协调管理科首席经济学家，姆巴巴内

Erik Reinert 先生，the Other Canon Foundation 主席，奥斯陆

John Weeks 先生，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退休教授

Ruhul Amin Sarker 先生，商务部对外贸易协议司联席秘书，达卡

Jomo Kwame Sundaram 先生，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主管经济发展事务助理秘书长(从纽约通过视频会议参加)

7. 应邀参加专家会议的个人有：

Hourik Hayrbedian 先生，贝鲁特美国大学经济系教授
